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8.03.020

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在 翻译研究中的应用^①

庞学峰^{1,2}

(1. 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2. 云南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 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打破了传统传媒研究的意义透明观, 认为大众传媒是在一种特定的符码系统中运作, 受众可能会采取主导、妥协甚至对抗的三种解码立场, 强调通过积极解码参与对霸权意识形态编码的斗争。该理论对翻译研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充分阐明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 而是从特定的符码系统中产生, 翻译是一种典型的解码和编码行为。而且, 较之信息论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和翻译中的改写操纵论, “编码/解码”理论在翻译研究中有着自身的理论优势。

关键词: 编码; 解码; 翻译; 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18)03-0149-06

斯图亚特·霍尔(1932-2014)是英国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20世纪70年代初, 霍尔“结合诸多欧陆新思潮, 对意识形态霸权的微观机制给出了一种全新的理论分析框架”^①。1973年, 霍尔在莱斯特大学做了题为《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的学术报告。随着文化研究在世界范围内遍地开花, “编码/解码”理论在大众文化和传播研究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一理论中的编码、解码方式以及解码立场与翻译研究十分契合, 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 霍尔的“编码/解码”较之信息论的编码、解码和翻译中的改写操纵论有着明显的理论优势。

一 霍尔“编码/解码”理论的核心内容

(一) 传媒产品制作中的编码

霍尔在《编码/解码》中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生产、流通、消费和再生产的理论模式, 将大众传媒的流通业分为生产、成品和消费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在传媒领域又被称为编码、成品和解

码。编码是指电视专业工作者对新闻原材料进行加工, 通过加工才能进入流通和传播领域, 编码的过程正是传媒产品的生产过程。作为传播对象的原材料是不能直接进入到流通领域, 必须通过加工制作, 也即是编码, 之后才能作为产品而传播。“一个‘未经加工的’历史事件不能以这种形式通过电视新闻来传播。”^②事件必须通过编码才能成为节目进入到流通领域, 经过编码的节目或媒介传播的产品, 往往被看作是对事件的真实再现。

霍尔对这种真实性提出了疑问, 他认为在电视专业工作者对电视节目的原材料进行加工的时候, 代码是支配这个过程的关键。“代码是解读符号和话语之前预设的, 已经存在于加工者脑海之中, 就像作为语言代码的语法, 被看作是自觉自然的过程。”^③代码是支配节目加工制作者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等, 这是节目加工者应用中的知识。这样经过编码做成的节目成品, 必然带有主导的意识形态在里面。传媒产品不是对原材料的真实再现, 而是带有意识形态的产品, 是权力意识形态框架下的产物。在霍尔看来, 各种待传播的信息

① 收稿日期: 2017-12-21

作者简介: 庞学峰(1980-), 男, 河南驻马店人, 博士生, 副教授, 主要从事翻译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研究。

① 张亮:《斯图亚特·霍尔意识形态理论的中国反思》,《河北学刊》2016年第5期。

② 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载《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2页。

③ 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页。

的霸权产生于政治和军事精英等有关人员的意识形态,他们通过职业符码的操作,选择媒介播放的场合和样式,选择影像和现场辩论,使得意识形态以一种隐藏的方式得以传播。即使是电视中的画面也不能说是真实的再现,因为在霍尔看来,在电视图像中,视觉话语将原始的三维世界转换为图像的二维世界,所以它就不能成为被指称的对象或概念。

(二) 解码与意义的获得

经过编码的传媒产品必须经过受众的解码才能生成意义,这种意义观也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传媒意义观。传媒的原材料经过编码,成为传媒产品而出现在流通领域,受众需要通过解码这个程序才能对传媒产品进行消费。“观众面对的不是社会的原始事件,而是加工过的‘译本’。观众必须能够‘解码’,才能获得‘译本’的意义。”^①这里,霍尔通过“解码”这个概念,提出了新的传媒学意义观。在此之前的美国传媒学派认为媒体产品是一种“透明”的意义载体,意义是通过媒介产品原封不动地传递给受众。而在霍尔看来,意义是受众通过“解码”的方式建构出来的,对传媒产品的解读如同对信息和意义的生产,是一种积极的动态活动。“换言之,意义和信息不是简单被‘传递’,而是被生产出来的;首先产生于制码者对日常生活原材料的编码,其次产生于观众与其他话语的关系之中。每一阶段都举足轻重,运行于自身的生产条件之中。”^②因此,传播不是在真空下进行的,不是通过作为意义承载体的媒介一成不变地传播到受众那里的,这其中涉及到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力量交织在一起,主导的意识形态贯穿于其中,有主导的意识形态,也有对抗的意识形态。在这些意识形态当中,有接受、对话、协调和抵制。

(三) 解码立场

尽管在编码中,意识形态贯穿其中,但受众不是被动地去接受其中的意识形态,意义的生产和产生作用的方式取决于受众的解码立场。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受众对已编制好的节目的解码是一个建构和生产意义的过程,并不是将编码的节

目作为一个整体原封不动地接受和认可。所以霍尔指出:“毫无疑问,字面的误解的确存在。观众不懂使用的术语,不能跟随争论或展示的逻辑,不熟悉语言,觉得概念太陌生或太难,被阐述的叙事所欺骗。但更常见的是广播员担心观众不懂他们作为广播员所预期的意思。他们真正要说的是观众未能运作于‘支配’或‘建议’的代码之中。”^③解码也是意义的接受和生产过程,受众在解码的过程中建构了意义,或者发现了别的意义。霍尔提出了三种解码立场的假说,也即是著名的“霍尔模式”。

第一种解码立场是支配—霸权立场(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这一解码立场下,受众的解码立场和传媒产品制作者的编码立场是一致的,受众在编码者的支配代码之内,对传媒产品进行解读。在这种情况下,受众“在主导的符码范围内操作”^④。

第二种解码立场是协调的符码(negotiated code),也称为“协商立场”。持这一立场的受众一方面承认编码者所持有观点的权威性,但同时也坚持强调自身情况的特殊性。霍尔举的例子是在与《工业关系法案》相关的新闻中,工人们既接受传媒产品编码的意识形态,同意降低工资以便抵御通货膨胀的说法,但同时也坚持和愿意为了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而罢工。这样,它使宏大叙事的编码意识形态和自身的局部情况协调起来,保留自己的权力与适合它本身利益的团体地位。

第三种解码立场是对抗的符码或立场(oppositional code or position)。在这种立场下,受众完全不同意编码者的意识形态,以一种完全相反的方式去解码。如上面的例子中,编码者预设了这样一种立场,也即是为了国家利益而限制工资,作为受众的工人会采取对抗的立场去进行解码,从而将“国家利益”解读为某个阶级的利益。对于持这一立场的受众来说,他们完全理解编码者的意识形态预设,但是采取了对抗的方式,以完全相反的方式去解读,从而颠覆编码者的意识形态。

①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8页。

②Storey, John.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Studies of Popular Cultur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1.

③Hall, Stuart. *Encoding/decoding*, in Stuart Hall, Dorothy Hobson, Andrew Lowe & Paul Willis (Ed), *Culture, Media, Language*, London: Hutchinson, 1996, p. 135.

④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载《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2页。

二 “编码/解码”理论的应用价值

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传媒手段,也具有传媒行业所拥有的编码和解码特征,并且霍尔的编码和解码理论在翻译中体现的尤为明显。翻译过程基本体现了霍尔的“编码/解码”这一生产和消费模式,翻译领域成为符码系统与社会权力发挥功能的场域。而且,与其他的传媒方式相比,翻译中的编码/解码行为有着自身的特殊性。

(一) 揭示翻译的解码特征

与其他传媒方式不同,翻译首先是一种解码过程,它首先要对原文进行解码。翻译的过程首先面对的是既存的原著文本,翻译主体不是首先要制作文本,而是要解释文本,而解释就是一种解码的过程。因此,与其他传媒方式相比,翻译产品的制作有所不同。两者之间虽然同是编码和解码行为,但作为产品制作者的译者,最先需要做的不是对原材料进行编码,而是对原材料进行解码,之后再行进行编码工作。

翻译不是仅仅只有语言之间的转换,也涉及到对原文的解码,恰当的解码是进行翻译的前提条件,忽视解码或错误的解码会造成不恰当的翻译。在翻译中,如果仅做到原文进行语言转换而忽视对原文的解码,就会造成对原文的扭曲,或者导致原文交际功能的丧失。原文中的一些惯用的表达方式有着特殊的语用意义,蕴含着特殊的文化现象。这些特殊的表达方式所赋予的文化内涵是一种文化编码,它必须经过恰当的解码才能传达原文的真正意义。例如,《红楼梦》中有这样一句:“近日宝玉弄来的外传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鸳鸯,或有凤凰。”^①这句话中的“鸳鸯”和“凤凰”都蕴含着一定的文化编码,有着特殊的联想意义,象征的爱侣相伴。如果不进行解码,将其直译为“mandarin duck”则不能完全传达出原文的文化编码,因此霍克斯将这部分翻译为“a pair of lovebirds, a male and female phoenix”^②,准确地传达出原文的文化意义,是对原文的正确解码。

译者对原文的解码过程也是意义的生成过程,是对原文意义的重新建构。译者在对原文的

解码过程中,必然会进行意义的重新建构,会进行意义的取舍。从现代阐释学的视角来说,这种意义的重构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译者总是在自身的思维先结构的支配下对原文进行解读的,他不可避免地受到诸如思维习惯、知识结构、文化传统等种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构成了译者的代码系统。它们深入到对原著文本的重新理解过程之中,使得对原著文本的解码活动不能完全忠实于原初语言的文本及其思想。正是由于需要对原著进行重新解码,导致原初话语与译文话语的冲突,而这种冲突体现出解码的作用,即突破译文原著的限制,彰显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赋予译文作品以新的价值。

(二) 翻译的二度编码

与传播节目一样,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区别于一般的一次性进行编码的行为,翻译活动作为一种编码行为,更确切说是一种二度编码行为。“译员的二度编码过程就是将包含外国文化内涵和外延的源语言符号转化为易于本国文化人接受的文化内涵和外延的二度符号。”^③译者在翻译的时候,总是带着自己的思维和理解先结构去建构译文,并且在译文中加入意识形态等因素,以便使译文达到某种预期的目的,因此它不是一种透明的表述。而这种意义建构的过程实际就是一种二次编码过程,原著文本的建构已经是第一次编码,而译文文本则是对原著内容解码之后的再编码,这种二次编码是对“故事”的再次加工,就是“故事的故事”。

二次编码也会受到代码系统权力的影响与制约,而且与身份和意识形态的布展息息相关。如前文所说,代码系统预设加工者的脑海之中,如同一种自然的过程。因此,翻译不可能是对原著文本的忠实转述,而是一种与权力相关的文本语言转换策略,“翻译策略都与权力压迫或权力反抗息息相关,翻译策略就是权力策略”^④。在翻译中,译者的身份也是制约翻译中二度编码的因素。“在霍尔那里,‘身份’是主体与话语权力斗争、妥协的产物,是处于话语权力控制下的主体的自我想象。”^⑤在翻译中,“个人与机构都将他们特定的

①曹雪芹:《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36页。

②Hawkes, David. *The Story of the Stone*.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7, p. 589.

③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4页。

④Gentzler, Edwin & Tymoczko, Maria. *Translation and Power*.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2, p. xx.

⑤张亮:《如何正确理解斯图亚特·霍尔的“身份”》,《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7期。

信念放置于翻译之中,以产生各种不同的效果”^①。翻译过程中,翻译者是处于某种特定社会关系之中的,受到各种权利与利益的影响与制约,这都会影响翻译者对于原作品内容的选择与理解,进而影响翻译者对作品的编码过程。在这里,译者背后权力斗争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源语文化地位和译语文化地位之间的关系、译入语文化语境中制约译文接受的文化因素、译入语文化主流的意识形态、译入语文化内部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译者思维的先结构等。它们也是影响和制约译文编码的因素。译者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都会受到这个代码系统的制约。例如,《鲁拜集》的英译者爱德华·菲茨杰拉德“以高扬的‘骑士’精神处理波斯文人的作品,实际上,这一态度代表了西方译者对伊斯兰文学的普遍认识”^②。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翻译的这个代码系统对译者身份和翻译态度的影响,译者的霸权主义以及与原作符码系统的对抗在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从代码系统的视角来进行翻译研究,其任务之一就是打破这个代码系统,向读者展示其中的霸权主义行为和意识形态操纵。

译者在生产翻译产品的时候,对译作进行编码,使之能够服务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和翻译目的。由于诗学观、赞助人、审美意识形态、个体意识形态、文化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前结构”、经济意识形态、媒介意识形态和后现代意识形态的影响,翻译的解码、编码与再解码过程呈现出多种样态。译者往往通过编码的方式,将某种意识形态或特定的翻译目的带入到译本中去,可以说“译作是各种意识形态交锋的场所”^③。

与母语表达中的编码相比,翻译中的编码更具有隐蔽性,使其完全不被注意到。与传媒产品的编码一样,译者通过对原文进行重新编码,将意识形态隐藏在译文中,就好像原本本来就是这样。在传统翻译理论话语下,译文读者很难发现这种隐藏在译文中的霸权的意识形态,因为传统的翻译理论是建立在以“实在”和“再现”为主要特征的西方形而上学认识论基础之上的,翻译的“透明”与“单义性”掩盖了译者的编码行为。“经由

翻译而传播开来的占主导地位的表征再现,便逐渐被视作是‘自然’且‘真实’的东西。”^④这种做法和电视节目制作者的编码一样,具有隐蔽性,也正如霍尔所指出的那样,视觉符号的“意识形态价值被强有力地固定下来——因为符号已全然变得普遍和‘自然’”^⑤。

(三) 翻译的解码立场

尽管意识形态贯穿于编码过程中,但受众不是被动地去接受其中的意识形态,而是在自己的先结构的支配下,以自己的利益为主导,去解读经过编码的传媒节目。解码是意义的接受和生产过程,受众在解码的过程中建构了意义,或者发现了别的意义。霍尔提出了三种解码立场的假说,即支配-霸权立场(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协调的符码(negotiated code)也称为“协商立场”与对抗的符码或立场(oppositional code or position)。这三种解码立场,代表着三种对传媒节目进行解读的方式,同时也说明编码和解码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和吻合的,而是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关系。

第一种解码立场是支配-霸权立场,持这种解码立场的译文读者按照译者的编码方式来解读译本。在这种情况下,译文读者认为译著是对原作的忠实再现,是原作者意图的真实表达,而译者只是作为语言转换的传声筒,忠实地表现了原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容。持这种立场的读者认为语言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不会注意到翻译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从而使译者达到了传播意识形态的目的,译者的意识形态支配着读者。

第二种解码立场也同样是协商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别,译者无法做到跟原文完全一致。译文读者或翻译作品的受众注意到了译语在某种程度上的偏差,但仍然肯定译文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翻译的功能,达到了翻译的效果。例如,《红楼梦》霍克斯译本的读者,会在一定程度上指出译者在某种程度上与原文之间的偏差,但认为这种偏差没有从整体上损害原著整体的文学性,反而使译文更具有可接受性。在译文受众看来,由于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译者在一定程度上对原作的偏

① Baker, Mona.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 107.

② 杨柳,王守仁:《文化视域中的翻译理论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页。

③ Perez, Maria Calzada. *Apropos of Ideology*, Manchester and Northampton: Jerome Publishing, 2003, p. 2.

④ 尼南贾纳:《为翻译定位》,载《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页。

⑤ 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载《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8页。

离是不可避免的。由于翻译中文学性不可避免的丢失,而译者采取某些方式进行补偿也是合理的。

第三种解码立场仍然是对抗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译文读者通过对抗的符码解读译文,找出译文中隐藏的意识形态,并说明其译文是霸权主义的一种表现。从而指出,译者试图通过对译文操纵,强行向译文读者推行其霸权的意识形态,以达到某种目的。例如,早期一些来华传教士就是这样来翻译中国典籍的。如果我们用对抗的立场来解读这些传教士译本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对译文的操控。从马约瑟对《易经》的翻译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这一点。《易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易经·否卦》九五爻辞)马约瑟的译文为:“The evil is extinguished. The Great Man has brought about good fortune. Alas! He has perished! He has perished! He has been hung from a tree.”^①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警戒覆亡,贵族王公如此存心则吉利。危险呵,危险,国家命运好像系在柔弱的苞草、桑枝上一样。”^②有研究者发现,马约瑟的译文与原文毫不相干,带有明显的基督教的影子,也即是耶稣为拯救人类而牺牲自己^③。这样,译文读者站在对抗的解码立场上,认为早期的传教士在翻译中国典籍的时候,是在用基督教的教义来对中国典籍进行附会,目的是在为其在中国的顺利传教铺平道路。译文读者和研究人员通过这种立场的解码,就会在翻译文本里面发现异源性。“它们的异源性(heterogeneity)导致原语文本和译语文本之间、甚至译文内部的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这就是种族中心主义暴力行为的症状。”^④于是译本背后深藏的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翻译中的文化暴力就一目了然,翻译与意识形态的对抗便昭然若揭。

需要补充的是,虽然都是一种理解行为,翻译读者或受众的解码与译者对原文的解码是不同的。译者对原文的解码是理解原文的过程,其中涉及到对原文中文化内涵意义的解码、对原文中的隐喻和言外之意的理解。对原文的解码是一种

理解行为,是对语言外信息的把握。与译者对原文的解码不同,译文读者或受众的解码行为是对翻译中所隐藏的意识形态的一种态度,这是一种文化行为,其背后翻译了各种力量之间的交锋。积极的解码立场关注的是翻译产品制作过程中所带入的意识形态因素,使译者通过编码注入到翻译中的意识形态昭然若揭。

三 翻译“编码/解码”理论优势

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更注重语言之外文化与意识形态等因素,因此,较之传统信息论的解码/编码,霍尔的理论能够解释翻译背后的意识形态等因素。传统信息论是通讯交流领域的理论,是建立在信息转换中的等值与等量的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美国贝尔电话公司的研究人员C.E. 香农(C. E. Shannon)创立了信息论,提出信息传输中编码、解码的精确性以及信息等量的原则^⑤。这种信息论被运用到翻译理论中,它主要关注的是“译者在编码过程中必须考虑传输负载、信道容量、噪声和冗余等因素,并充分利用冗余,使译文读者得到与原文读者基本相同的感受”^⑥。在翻译中,由于两种语言文化之间固有的差异,译文就会出现信息传输过载(communication overload),造成信息负载大于译文的信道容量,形成堵塞,译文艰涩难懂,没有起到翻译的作用。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得增加解释性的冗余信息,而且要拉长传输通道,做到冗余平衡。由此可见,传统信息论中的解码、编码只涉及到翻译中两种语言之间的信息传输与信息对等,无法关注到翻译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使隐藏在翻译背后的意识形态显现出来,其三种解码立场更适用于去解读各种形式的翻译文本,使其解释力具有普遍有效性。

较之翻译中的“改写操纵论”,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在翻译研究也有着不可替代的理论优势。翻译中的“改写操纵论”认为翻译是一种改写,反映了一定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对原

①申连云:《尊重差异——当代翻译研究的伦理观》,《中国翻译》2008年第2期。

②徐子宏:《周易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页。

③申连云:《尊重差异——当代翻译研究的伦理观》,《中国翻译》2008年第2期。

④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

⑤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页。

⑥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61页。

文的操纵^①。这使翻译研究关注到翻译背后的文化因素,但它有两处理论缺陷:其一,它对“忠实”标准进行消解,并过分注重翻译中的操纵和创造,这就使它滑向了相对主义的泥潭,因此受到学界的诟病。以对“忠实”的消解来关注文本背后的操纵因素,但最终会使操纵和改写成了消除“忠实”的借口。改写操纵论忽视了被悬置的忠实性问题,在翻译学的本质属性上偏向于改写和操纵,甚至提出了不顾“忠实”抛弃“对等”的翻译主张,这就使翻译研究失去了对原文进行评价的参照系统,滑向相对主义的泥潭^②。其二,改写操纵论过多地强调意识形态的操纵和支配作用,因而忽视了翻译产品流通过程中的协商和对抗。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既能使翻译研究关注本后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又能很好地避免了改写操纵论的理论缺陷。首先,“编码/解码”理论以还原传媒作品中原材料的真实性为出发点和目的,使隐藏在传媒产品中的意识形态暴露出它真实的面目。因此,运用到翻译研究中,它不是以对“忠实”的消解来换取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关注,而恰恰是以“忠实”为出发点和归宿。其次,

“编码/解码”理论使翻译研究既注意到意识形态的霸权和支配因素,又关注不同意识形态的协商与对抗。

结语

翻译原本就是一种解码和编码行为,霍尔的理论不仅翻译产品和电视节目产品一样,二者都是在一定的符码系统中运作,都是意识形态的藏身之处,且都具有高度的隐秘性。翻译过程并非一种客观和中立的线性过程,而是一种充满符码权力的解码与二次编码的动态过程,译文读者与译文内容之间同样存在紧张的解读关系与复杂的异样立场。与电视节目制作不同的是,译者首先要对原材料(原文)进行解码,然后再对译文进行编码,这是一个先解码后编码的过程。在对原文的解码和译文的重新编码的过程中,都会存在意识形态的介入。译文读者和翻译研究者的任务就是打破这种符码藩篱,通过协商和对抗的立场去进行主动解码,从而发现潜藏在译文中的意识形态意图,并揭示出产生这种意识形态的原因及其背后的利益关系和价值取向。

Encoding & Decoding: An Application of Stuart Hall's Theory in Translation

PANG Xue-feng^{1,2}

(1.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Stuart Hall's theory of encoding and decoding has rejected the traditional view on media by holding that media products like TV programs do not convey transparent meanings while they produce meanings through a specific coding system. Hall argues that the recipients should adopt the oppositional position to overthrow the ideology. Hall's theory of encoding and decoding has great significance o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at translation is not done in a vacuum and it is produced through a specific coding system, which proves that it is a kind of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addition, compare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heories and the school of "rewriting and manipulating theory" in translation studies, Hall's theory of encoding and decoding has its own advantages in translations studies.

Key words: encoding; decoding; translation; ideology

(责任校对 朱正余)

^①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 vii.

^②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